

漢魏佛教與聲律理論關係考論

高文強 王 婧

武漢大學文學院

一、引言

漢魏是佛教入華的初傳期，由於佛教一系列觀念和行為方式與獨尊以來的儒家有著尖銳衝突，因此，佛教初傳時期在社會中的影響力相對有限，在文人士大夫階層尤其如是。從現存文獻來看，漢魏時期文人與佛教相關之事蹟，除漢明帝夜夢金人傅毅解夢、曹植感魚山梵聲而制唄等記載外，幾乎再無；文人流傳至今的作品中與佛教相關聯的內容也少之又少。正因如此，「漢魏佛教與文學」這一主題在文學史研究中向來關注較少。本文選擇這一主題來討論，主要基於以下考慮。

佛教對文學產生影響，一種方式是直接表現於文學內容或形式之上，這也是學術研究中人們最喜愛考察的一條路徑；另一種方式則是間接表現於文學內容或形式之上，這種影響常常通過佛教入華衝擊中國文化使其新變，然後投射到文學上這一路徑而實現。佛教對文學的直接影響易考察但卻非主要路徑，間接影響難考察但卻是佛教影響文學的主要方式。「漢魏佛教與文學」這一主題之所以關注較少，大概與這一主題中佛教對文學的直接影響極少有很大關係。若我們換一個視角，從間接影響的角度來考察，或許能發現這一主題中前人忽略掉的一些線索。間接影響的發生常常並非立竿見影，或許，漢魏時期佛教影響文學的一些因素已然產生，但實際產生影響卻要經歷一個文化新變的漫長過程，這也正是間接影響的特徵所在。本文選取聲韻理論中的一些因素作為考察對象，嘗試通過間接影響的路徑，考察漢魏佛教對文學的影響。

二、聲律理論與文學

詩的音節聲調之美，是詩的形式美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古代詩人與文藝思想家對詩的音節聲調之美的追求，經歷了一個由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較早對詩的語言從音節聲調之美的角度提出要求的是司馬相如：「合綦

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作賦之跡也。」（《答盛攬問作賦》）¹要求賦的語言能夠把不同的聲調（「一宮一商」）交叉組織起來（「一經一緯」），具有悅耳的音響之美。之後陸機《文賦》強調「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詩賦之作不能「寄辭於瘁音」，而應作到章節響亮，不同的聲調互相交替變化，猶如五色搭配使用而使色彩更加鮮明一樣：「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他們都感到字音的聲調是有差別的，但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能用音樂上「宮商」變化等概念作出籠統的類比。範曄比他們進了一步，《宋書·範曄傳》載：「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善彈琵琶，能為新聲。……曄獄中與諸甥侄書以自序曰：『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為空談。』」他不但借用「宮商」、「金石」等聲韻概念，而且從文字聲調方面開始提出了「清」與「濁」的聲律概念：「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這裡的「清濁」已非曹丕「氣之清濁有體」的含義，而是與音樂上區分「宮商」之調相類似的文字聲調之區別了。范曄稱讚「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懂得詩的聲韻之妙。鐘嶸《詩品序》曾引王融語，稱范曄、謝莊「嘗欲進《知音論》，未就」。可惜的是他還沒有來得及把它寫成文字，就被殺了頭。²直到永明時期才真正進入了詩歌聲律理論的自覺階段。

永明文人在口語中已然對聲律頗為重視。《南齊書·劉繪傳》載：「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周顒並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南齊書·張融傳》載：「《門律自序》曰：『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南齊書·周顒傳》也說：「顒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泛涉百家，長於佛理。……每賓友會同，顒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周顒《重答張融書難門律》曰：「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即色非有，故擅絕於群家耳。」周顒還撰有《四聲切韻》。可以看出，宋齊之際人們對漢字聲、韻、調三者的認識已經全備了，音韻學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文化學術的各個領域，向來是在多學科的交融中前進的，一個學科的突破性進展，必將使得相鄰學科改變面貌。音韻學的發展為文學突進提供了一次歷史機遇，而永明文人敏悟地抓住了這一時機。「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詩品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佛學東漸與六朝文學思潮的嬗變研究」（14BZW028）；獲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華思想通史」項目資助。

¹ 嚴可均輯：《全漢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221。

² 參見郁沅、張明高：《魏晉南北朝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頁258-259。

序》)，從此創造了一種嶄新的文體，在文學的發展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永明體的最大特點即聲律論的運用。沈約在其《宋書·謝靈運傳論》中對聲律論有詳細論述：「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制，諷高曆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睹。」可見聲律的核心問題正在於如何調配四聲，以求得詩歌音律上的錯落有致、抑揚頓挫的美感，以避免詩歌聲調上的單調。

文人對詩文聲音之追求，其實必須依賴音韻學這一「工具」的成熟運用。聲律論是以四聲制韻而運用於詩文創作之中，因此它的提出，是建立在人們對漢字聲、韻、調的自覺認識的基礎之上的。早期雙聲、疊韻、押韻現象及合音字的出現並不是一種自覺的行為，至漢末反切注音法的發明，才使人們開始對漢字聲、韻有了自覺認識，標誌音韻學自覺的韻書也隨之開始出現。這些又直接促成了宋齊之時四聲的發現。而四聲的發現，使人們對漢字的聲、韻、調三方面都有了自覺認識，從而將音韻學的研究推向了一個高潮。正是由於音韻學的繁榮，才使文人自覺運用聲、韻、調的原理來創作詩文成為可能。因此可以說，音韻學的發展是永明聲律論產生的重要前提。而反切、四聲之於古代聲韻學的開拓作用，正如羅常培先生所言：「韻書之根據在反切，韻書之規模在四聲。」³韻書的出現，是古代音韻學走向自覺的標誌，反切注音、四聲分類的發明發現則是韻書創作繁榮的基礎。頗為巧合的是，反切的發明，漢魏時期佛教的傳播在其中起到關鍵性作用。

三、漢魏佛教與反切的發明

反切對於聲韻研究的開拓作用，前人早有認識。清人戴震謂：「未有韻書，先有反切。反切散見於經傳古籍，論韻者博考以成其書。反切在前，韻譜在後也。」⁴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反切注音法的發明，是韻書得以出現的基礎。那麼，反切何以促成韻書的出現？其關鍵在於反切法對漢字聲、韻的自覺分解引發了人們對漢字聲、韻、調的獨立認識。這樣，人們經過分析，就可以清晰地認識哪些字聲、韻相同，哪些字聲、韻不同。而韻書

³ 羅常培：《漢語音韻學導論》（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頁83。

⁴ 〔清〕戴震：《聲韻考》卷1（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57年），頁2。

的特點正是把同韻的字或同音的字編在一起，以便於寫詩的人選字押韻。因此可以說，正是由反切注音而引發的對漢字聲、韻的自覺分析，造就了韻書的出現，說「沒有反切就沒有韻書」⁵並不過分。然對漢字聲、韻自覺分析的能力得利於何？是本土析音方式的自然延伸，還是外來拼音原理的啟發結果？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似西域二合之音，益切字之原也。」⁶清戴震亦云：「《廣韻》卷首論曰：『切韻者，紐雙聲疊韻。』此蓋創立反語之本。」⁷將二合音、雙聲、疊韻視為擊開音節的力度來源為不少研究者贊同，但亦有可獻疑之處。沈括所言漢字二合音和西域二合音其實本質上是不一樣的。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梵書二合音，並不分為兩字而為一詞，漢語二合音，卻又分來兩字。前者是語詞用字母表示的音素拼合；後者是雙音節詞的母音脫落。前者是自覺的使用；後者是不覺的沿襲。」⁸二者是不可等量齊觀的。沈括的類比雖不完全恰當，然其已經敏銳地感覺到，西域二合音實為反切法之源，故他說：「切韻之學，本出於西域。」⁹宋張昞《雲穀雜記》亦云：「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¹⁰梵學入華，得力於佛學東漸。《隋書·經籍志》曰：「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書之義殊別。」所謂「十四字」，是指梵文十四母音。梵文是拼音文字，梵文字母稱為「悉曇」，據《悉曇藏》，悉曇字母分為兩類：一類為「摩多」，一類為「體文」。摩多即是母音字母，體文即是輔音字母，兩者基本上相當於漢語的韻母和聲母。章太炎《音理論》謂：「體文者，紐也。」¹¹即指體文就是聲紐。梵文母音有十六個，其中屬「別摩多」者有四個，其餘十二字全屬摩多，或稱十二韻。末後的暗、惡二字是阿字的轉化，故亦有將其剔除而前十四字稱為十四音者；輔音則有三十五個。摩多、體文的拼切可以形成眾多梵文文字。據唐義淨《悉曇十八章》載，摩多、體文相互拼切成十八章，合計一萬多字。如其第一章以體文三十四字（去 lam）分別與十二韻相拼，共得

⁵ 唐作藩：《音韻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77。

⁶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15（北京：古典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505。

⁷ 〔清〕戴震：《聲韻考》卷1，頁2。

⁸ 李葆嘉：《當代中國音韻學》，（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31。

⁹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15，頁505。

¹⁰ 〔清〕謝啟昆：《小學考》卷31（杭州：浙江書局版，1888年），頁17。

¹¹ 轉引自饒宗頤《梵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95。

四百零八字；第二章將體文三十四字除 ya、ra 兩字（或並除 na 字），先與半母音 y（a）相拼，再與十二韻相拼，共得三百八十四字（或三百七十二字）；第三章，將體文三十四字除 ra 字（或並除 na 字），先與半母音 r（a）相拼，再與十二韻相拼，共得三百九十四字（或三百八十四字）；……梵文文字的這種元輔拼合原理與漢字聲韻拼合原理是多麼相似，因此視梵文拼音原理為擊開漢字音節的外來力度是合乎邏輯的。唐作藩先生也曾如此推斷說：「當時中國的和尚和學者在學習梵文中受到字母悉曇的啟發，懂得體文和摩多的拼音原理，於是創造了『反切』這種注音方法。」¹²那麼這種邏輯的合理性是否合乎歷史的真實呢？

梵學是隨著佛教東傳而為漢人逐漸知曉的。佛教傳入漢地的時間目前已很難確定。佛法當在西漢時已由北天竺傳佈中亞各國，而此時漢武帝銳意開闢對西域之交通，其後西域各國與漢內地的政治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一直十分頻繁，佛教正是在這種交流中逐漸傳入漢地。佛教傳入漢地的最早可信記載，為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 2）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後楚王英齋戒浮屠、漢明帝感夢求法於大月氏抄回《四十二章經》的記載則進一步表明了佛教在東漢的流布。從這些早期記載可知，漢地與西域諸國的文化交流包括語言交流是頗為頻繁的，在此階段或許人們已經對西域梵文或胡語的拼音文字有所瞭解。不過，早期佛教的傳播情形現在已無法知曉，佛經翻譯的具體情況也不得而知。目前有文獻可考的最早佛經翻譯者是漢末安世高和支讖，雖然此前已有《浮屠經》和《四十二章經》流傳，但其翻譯詳情已不得而知。安世高於桓帝建和初年（147）至洛陽，在華輾轉約三十年，據《出三藏記集》中《道安錄》載其翻譯佛經三十五部四十一卷。其後不久（167）支讖來華譯經，譯經數量已不可考。但可以確知的是，安、支譯經時已有梵本胡本傳入漢土，據《高僧傳·安清傳》載：「初外國三藏眾護（僧迦羅叉）撰述經要為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為漢文，即《道地經》是也。」又《高僧傳·支樓迦讖傳》載：「漢靈之時，齋《道行經》來適洛陽，即轉梵為漢。」又載：「先是沙門曇果于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共竺大方譯為漢文。」因此可以確認梵文拼音至遲在桓帝之時（147-167）已為漢人所認識，而實際的認識時間恐怕比這還要早。

頗為巧合的是，反切注音法的出現恰在這之後不久。《顏氏家訓·音辭》謂：「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以孫叔然（孫炎）為創制反切之祖。日本安然《悉曇藏》引武元之《音詮》反音例曰：「服虔始

¹² 唐作藩：《音韻學教程》，頁 76。

作反音。」(《悉曇藏》卷1)奉服虔為反切之始。章太炎《音理論》又根據《漢書·地理志》應劭注已有反語，斷定「應劭時已有反語」¹³。吳承仕《經籍舊音敘錄》亦曰：「尋顏師古注《漢書》，引服虔、應劭反語不下十數事，服、應皆卒于建安中，與鄭玄同時。是漢末已行反語，大體與顏氏所述相符。至謂創自叔然，殆非實情。」服虔、應邵、孫炎具為漢末人士。服、應二人初平元年(190)時一為九江太守，一為泰山太守，二人約卒於建安年間；孫炎則略晚於二人。服、應二人用直音的同時偶用反切，孫炎則為反切大量運用者。這裡有一個問題我們必須注意，即現有資料記載的反切的最初運用者並不代表一定是最初的發明者，因反切開始實際運用須有一個前提，即要有一個認可這種方法的群體存在，否則這種注音方法毫無實際意義。服、應以反切注音，說明此法已為一定群體認可。那麼最初發明反切並推廣到一定群體的是什麼樣的一群人呢？本文以為最早發明者當是由外來僧人為中心所形成的譯經群體。

如前所述，早期傳教譯經者多為外來僧人，外僧來華傳教譯經，必先研習漢語。如安清「通習華言」(《高僧傳》本傳)，安玄「漸解漢言」(《高僧傳·支婁迦讖傳》)，又支亮「妙善方言。乃收集眾本，譯為漢語」(《高僧傳·康僧會傳》)。且早期佛經翻譯常非一人完成，而是多人承擔。其中外僧作主譯，其他人做助譯，助譯者多為漢人。如《高僧傳·支婁迦讖傳》載：「朔(竺佛朔)又以光和二年(179)於洛陽出般舟三昧，讖(支讖)為傳言，河南洛陽孟福張蓮筆受。」又：「玄(安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又：「沙門曇果于迦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共竺大力譯為漢文。」又：「世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為難繼。調又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而且象安世高門徒眾多，除嚴佛調外，還有南陽韓林，潁川皮業，會稽陳慧等。由於翻譯的需要，外僧與漢人助手對梵漢語言音義必多探討，如稍後的鳩摩羅什僧團譯經：「法師手執胡本，口宣秦言，兩釋異音，交辯文旨。秦王躬覽舊經，驗其得失，諮其通途，坦其宗致。與諸宿舊義業沙門釋慧恭、僧契、僧遷、寶度、慧精、法欽、道流、僧睿、道恢、道標、道愴等五百餘人，詳其義旨，審其文中，然後書之。」(《出三藏記集》卷8《小品經序》)因此可以說譯經集團也是一個梵漢語言的研究集團。梵文為音節文字，以音統字；而漢語是表意文字，音形分離。故外僧研習漢字的過程中很可能會用梵書拼寫漢字，研析漢字音節。這一推測在後世胡漢語言交流中可以找到類似例證。如唐時吐蕃曾編有《蕃漢字書》，即用藏文字母拼切漢字；而伊斯蘭教徒也有用阿拉

¹³ 轉引自何九盈：《中國古代語言學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92。

伯字母拼寫漢字的經歷。同時，漢人學習梵語，必對其拼音原理要有瞭解，因漢語以字為音節單位，不象拼音文字以音素為單位，因此漢人學習拼音文字喜以漢字去表注音素，便於記憶理解。謝靈運作《十四音訓敘》正用此法。這樣，胡人以音拼切漢字，漢人則以漢字表音，兩者的交融正為反切之基礎。因此可以相信反切法在譯經集團這樣一個文化群體中間產生並非難事；不象漢儒，本無音素分析能力，欲創反切之法實屬不易。從當時的譯經情況來看也有利於這一推斷的成立。據《開元錄》載，從漢明永平十年（67）到東漢末年（220），佛經譯本已有 292 部 395 卷，這其中的譯經群體有安世高群體、支讖群體、安玄群體等；或支曜、康巨、康孟詳諸人譯經亦有群體，惟史載不詳。反切法在這些群體中產生是完全可能的。故唐作藩先生謂：「東漢初印度佛教傳入中國，而宣傳佛教教義的佛經是用印度古代梵文寫的，梵文是一種拼音文字，中國人要學習佛經，首先就要懂得梵文；另外，隨著印度佛教的傳入，也從印度來了一批高僧，他們為了宣傳佛教，當然也要學習漢語。在這種文化的交流中，中國的沙門和學者在梵文拼音方法的啟發和影響下，於是就創造了反切法。」¹⁴而從最初應用反切法的士人分佈情況看，也正與譯經群分佈相吻。如章太炎說：「以其地考之，漢世作反語者：服虔，滎陽人；文穎、鄧展皆南陽人；應邵，汝南人；蘇林，陳留外黃人，皆在今河南南部。而鄭君生北海，高誘生涿郡，則不作反語。疑反語初起，但在汝穎之間。」而漢末外僧，正集中於洛陽譯經傳教，反切在此間流傳開來，正與理合。¹⁵

此外，「反切」名之來源可以進一步證明上述推斷的成立。據美國學者梅維恒所撰《關於反切源起的一個假設》¹⁶一文認為「反切」與梵文「varna - bheda - vidhi」有直接的關係。這個三術語的組合在語義學的意義是「字母切讀的原則」（Letter - Cutting - Rules）。其中最可注意者是「bheda」恰恰與漢語「切」字的意思相符；而「varna」不僅僅聲音與漢語「反」字相近，而且在意義上也非常接近。「varna」有覆蓋、隱蔽、隱藏、圍繞、阻塞之意，可以被譯成「覆」；而圍繞等義，在漢語中又可以寫成「複」，它的同義詞便是「反」。因此，不論是從語義學還是從語音學的角度看，在梵文「varna」和漢語「反」字之間具有相當多的重疊之處。故梅氏認為，當時瞭解梵語「varna - bheda - vidhi」意義的僧侶和學者受到這組術語的啟發而發明了「反切」法。

¹⁴ 唐作藩：《音韻學教程》，頁 21。

¹⁵ 參見李葆嘉：《當代中國音韻學》，頁 35。

¹⁶ 參見劉躍進：〈求新聲於異邦〉，《文學遺產》第 4 期（1999 年 8 月），頁 29。

綜上所述，反切法主要受到梵文拼音原理的影響而產生，最先在漢魏譯經集團中開始運用，並逐漸為之外的士人學習、認可，進而推廣開來。當然，漢魏時期反切注音法的出現，對其時之文學並未有直接影響，然而，其後續在聲律理論方面的貢獻，卻對後來文學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比如反切對四聲發現的推動便是如此。

四、反切與四聲之發現

四聲的發現受到佛教影響學界現已不疑，但這種影響是如何發生的則嘗未定論。自陳寅恪先生《四聲三問》提出四聲的發現是受轉讀佛經之三聲的啟發，而轉讀佛經之三聲又出於印度古時聲明論之三聲以後，從者眾多。但也有少數者提出異議。如管雄先生說：「陳寅恪說聲調之所以定為四個而來為其他數目，系依據圍陀的三聲。這樣人工的四聲成立說，恐不可靠。」¹⁷又如俞敏先生根據僧律中有關禁止「外書音聲」的規定，認為以圍陀這種外書音聲轉讀佛經是不太可能的。因此「說漢人研究語音受聲明影響沒毛病，說漢人分四聲是『摹擬』和『依據』聲明可太胡鬧了。漢人語言裡本有四聲，受了聲明影響，從理性上認識了這個現象，並且給它起了名字，這才是事實。」¹⁸在反對者中，值得注意者是饒宗頤先生。他首先在《印度波爾尼仙之圍陀三聲論略》一文中對漢語四聲來自對圍陀三聲的類比的說法提出質疑，他認為《圍陀》誦法早在西元前二世經即已失傳，何以六朝時的中國僧侶能夠轉讀？而且，佛氏誦經，禁止用婆羅門誦法，且立為戒條。因此他認為陳氏之說「誠難令人首肯」¹⁹。更為重要的是饒氏在《文心雕龍聲律篇與鳩摩羅什通韻》一文中進一步提出四聲的發現是受梵文悉曇的影響。²⁰

其實換一個角度我們還可以發現，反切法的發明，就意味著四聲的發現已為時不遠了。反切注音推動了韻書的產生，如果我們稍微瞭解一下最初的韻書便可以感覺到人們對聲調認識的重視。潘徽《韻纂》自序說：「《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惟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為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未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才分宮羽。」（《隋書·潘徽傳》）所謂「判清濁」、「分宮羽」，

¹⁷ 管雄：〈聲律論的發生和發展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32。

¹⁸ 俞敏：《俞敏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43。

¹⁹ 饒宗頤：《梵學集》，頁82。

²⁰ 按：關於這一點，遼欽立先生早有論及。參見其〈四聲考〉，見《六朝文學論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即對漢字聲韻的判別。李登《聲類》，呂靜《韻集》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韻書，不過已佚。封演《封氏聞見記》載：「魏時李登，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魏書·江式傳》載：「忱弟靜別仿故左校會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兩書都是以五音分類，五音是指什麼？有人認為五音就是指某種方音的五個調類，有人認為五音是在四聲未發現之前藉以表達四聲的。以五音為五調顯然過於絕對，在四聲發現之前借五音表聲調實是古人常用方法，陳澧謂：「古無平上去入之名，借宮商角徵羽以名之。」（《切韻考》卷6）可見，《聲類》、《韻集》這兩部韻書都是以字調分類的，在四聲發現之前，韻書的分類基本依此。

以五音分調本是古法，而所謂五音其實既指字調，同時也含字韻，調韻混合是此時韻書的普遍特徵，魏晉人以此法編韻書反映了對字調認識的含混。王國維認為李、呂二人所論五音實指古音，二人所撰韻書是「不用魏晉音而用古音」²¹，以古之五音為魏晉音調歸類顯然難合。即使如某些人認為的五音正是當時某種方音五調，而隨著永嘉南渡文化中心的南移，南方語音的變化，²²也使魏晉五音已很難適合南方音調了。故南朝以後對五音多有批評，劉善經《四聲論》指出：「經每見當世文人，論四聲者眾矣，然其以五音配偶，多不能諧。」《隋書·潘徽傳》曰：「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才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難為用。」《魏書·江式傳》亦曰：「（呂）靜別仿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呂忱）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晉宋以後，隨著詩文創作中對聲律的逐步重視，以五音分類的韻書用於詩文創作自然不會令人滿意，故李季節批評《韻集》是「分取無方」²³，顏之推批評《韻集》有的韻「不可依信」（《顏氏家訓·音辭》）。所以，在晉宋之際，尋找一種比較合於當時字調的分類方式以利於創作中的聲韻運用自然成為當務之急。而佛教劉宋時期開始掀起的分辨梵漢音義的風氣，為四聲的發現提供了一個契機。

佛經翻譯一直是佛教傳播的重要手段，因此對翻譯理論和方法的探討一直是佛教大師們頗為關注的一個問題。但是在劉宋之前，佛教徒對翻譯的探討大都集中於文風之上，即所謂的文質問題。如道安偏於質的直譯說，鳩摩羅什偏於文的意譯說，慧遠的折中說等。至劉宋時期，對翻譯理論的

²¹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8（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341。

²² 參看周祖謨：〈魏晉音與齊梁音〉，《文字音韻訓詁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²³ 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頁104。

認識開始深入到梵漢音義的差異上來，其代表當屬謝靈運的《十四音訓敘》。據《悉曇藏》引慧均《大乘四論玄義記》載：

謝靈運云：諸經胡字，前後講說，莫能是正，歷代所滯，永不可解。今知胡語，而不知此間語，既不能解；故于胡語中雖知義，不知此間語，亦不能解。若知二國語，又知二國語中之義，然後可得翻譯此義，以通經典。故睿法師昔于此研采經義，又至南天竺國，經歷年歲，頗了胡語。今就睿公是正二國音義，解釋經中胡字曉然，庶夫學者可無疑滯。粗為標例在後，差可推尋云爾也。胡字一音不得成語。既不成語，不得為物名。要須字足，然後可得名物。不牽他語足句，則語不成。皆隨其他語，足其上字得也。此間語或有名同而字異，異字尋同名，得其語意。得其語意者，如食時求脯臘之脯，木作時求斧鋸之斧，隨言而取，得旨故不謬。至於字時，各有異形。今胡書意不然，皆字聲對，無有共聲通字者也（《悉曇藏》卷1）。

其後僧祐《出三藏記集》有《胡漢譯經文字音義同異記》對這一問題作了類似的概括。對胡（包括梵語）漢語言音義上的差異的認識在今天看來很容易理解，但於當時中國人來說，對梵語一類印歐語系的語言從理論上有所認識，實屬不易。對梵漢音義差異的辨識於劉宋時興起並非偶然，其原因有三：

其一，劉宋時期佛經翻譯的高潮使語言翻譯問題易成為佛徒關注的焦點。魏晉南北朝各代譯經以劉宋最盛，現據《開元釋教錄》僅列南朝各代譯經數目：宋，465部，717卷；齊，12部，32卷；梁，46部，201卷；陳，40部，133卷。劉宋一朝譯經數目比其他三朝之和尚多，可見其時譯事之盛。此時譯經尚有一特點，即譯者雖仍以外僧為主，但漢僧譯者開始增加，這些譯者多為西行求法歸來者，多精通胡語，因此胡漢語言之異同的問題易引起時人特別是漢僧的關注。

其二，西行求法運動的盛行，令漢僧通梵語者大增，特別是對梵語音義語法等理論的認識，為梵漢語言音義對比提供可能。西行求法，晉末宋初最盛。據湯用彤先生統計當時西行者有名可考者有：康法朗、于法蘭、竺佛念、慧常、進行、慧辯、慧睿、支法領、法淨、智嚴、智羽、智遠、法顯、寶雲、慧簡、僧紹、僧景、慧景、道整、慧應、慧崑、慧達、曇學、威德、僧純、曇充、竺道曼、法勇、僧猛、曇朗、沮渠京聲、道泰、法盛、僧表、法維、道普等數十人，而事蹟不彰或姓名不傳者，不知又有多少人，其足跡則遍及西域、天竺、南海各地。西行求法之目的，湯用彤先生以為「或意在搜尋經典，或旨在從天竺高僧親炙受學，或欲睹聖跡，作亡身之

誓，或遠詣異國，尋求名師來華。」因此西行者常為有學問之僧人，「故類能吸受印土之思想，參佛典之奧秘」²⁴。據載，慧睿曾「至南天竺界，音譯誥訓，殊方異義，無不必曉。」；法顯曾於中天竺「留三年，學梵語梵書」；寶雲「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誥訓悉皆備解」；法勇「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道普「經遊西域，遍歷諸國」，「善梵書，備諸國語」（見《高僧傳》各人本傳）。求法僧人將所學知識帶回漢地，大大提高了漢地僧俗審音辨義的能力。謝靈運《十四音訓敘》正是「諮（慧）睿以經中諸字並眾音異旨」（《高僧傳·慧睿傳》）而寫出的。

其三，《大般涅槃經》的翻譯則是梵漢音義辨析得以興起的直接導源。法顯《大般泥洹經》卷5《文字品》詳細地介紹了梵文的一些語音知識，這一內容相應出現在《大般涅槃經》北本卷8《如來性品》及南本卷8《文字品》，其中對「十四音」及梵文五十字音有詳細解釋。謝靈運參與了北本的改治，對經中所論梵文語音知識自然熟知，《高僧傳·慧睿傳》謂：「（謝靈運）諮睿以經中諸字並眾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敘》，條例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可見，《大般涅槃經》的翻譯直接引發了謝靈運《十四音訓敘》的寫作，也引發了對梵漢音義比較的研究。

《十四音訓敘》對梵文五十音的詳細介紹，其中最可注意者是其以反切法對梵語字音進行分析（見《悉曇藏》引文），其目的本在為學習梵語者提供便利，然而反切法最初本來自於梵字拼切之理，而此處又以漢切梵，如此梵漢相切的研究，使時人對梵語和漢語的音聲結構會有更多認識，從而為漢語聲調的判定提供了認識基礎。以漢切梵，謝靈運似為最早者，故興膳宏先生以為「以反切來標記梵文音聲等方法是他的苦心之作」²⁵。反切不僅是聲韻相切，亦對聲調有所要求，因此謝氏對梵漢音義的對比研究，為漢語借鑒梵文聲調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幫助。

反切的發明催生了韻書的出現，也催生了四聲的發現。自劉宋末四聲發現後，韻書開始大量產生，音韻學在南北朝開始走向繁榮。據《隋書·經籍志》載及謝啟昆《小學考》、王國維《觀堂集林》考證，南北朝聲韻之作總有數十家之多。如：李概的《音譜》、周研的《聲韻》、張諒的《四聲韻林》、陽休之的《韻略》、劉善經的《四聲指歸》、周顒的《四聲切韻》、沈約《四聲譜》、夏侯詠的《四聲韻略》、杜台卿的《韻略》、潘徽的《韻纂》、王斌的《四聲論》、僧旻的《四聲指歸》、釋靜洪《韻英》等，佚名之作尚

²⁴ 湯用彤：《湯用彤集·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279。

²⁵ 〔日〕興膳宏：《宋書·謝靈運傳論綜說》，見《六朝文學論稿》（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

有《群玉典韻》、《纂韻鈔》等，可謂「自茲厥後，音韻鋒出」（《顏氏家訓·音辭》）。反切的發明、四聲的發現為韻書的創作提供了重要手段，由此也為永明時期文學聲律理論的提出奠定了重要基礎。而文學創作上聲律論的興起使「聲韻之道大行」（《封氏聞見記》卷2），「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也逐漸成為齊梁時期文學創作的一種新風向。

五、結語

漢魏佛教的傳播，對其時音韻學的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反切法的發明便是其中一重要體現。反切的發明推動韻書的大量湧現，同時也推動了漢字四聲的逐漸浮出。劉宋以後，四聲被正式確認，並由此推動了永明時期文學聲律理論的興起。永明聲律理論的出現，其原因或有多方面，但漢魏時期反切法的發明可以說是促成這一理論形成的因素，而這一因素的出現，又與漢魏佛教有著密切關係。佛教對文學的許多影響，正是通過這樣一種間接方式而產生的，而且大多數時候都是如此。

徵引文獻

- 〔清〕陳澧：《切韻考》卷6，中國書店，1984年影印本。
 〔清〕戴震：《聲韻考》卷1，四川人民出版社，1957年。
 〔日〕興膳宏：《六朝文學論稿》，嶽麓書社，1985年。
 王國維：《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
 何九盈：《中國古代語言學史》，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
 李葆嘉：《當代中國音韻學》，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
 周祖謨：《文字音韻訓詁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俞敏：《俞敏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9年。
 郁沅 張明高：《魏晉南北朝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
 唐作藩：《音韻學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
 羅常培：《漢語音韻學導論》，中華書局，1956年。